

长安文化与唐诗 的政治精神

李世忠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本书为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编号：12JK0385）研究成果
获咸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获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重点建设学科项目资助

长安文化与唐诗的政治精神

李世忠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长安文化与唐诗的政治精神 / 李世忠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518-0546-9

I. ①长… II. ①李… III. ①长安(历史地名)—
文化史②唐诗—诗歌研究IV. ①K294.11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1603号

长安文化与唐诗的政治精神

李世忠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群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546-9
定 价 46.00元

网 址

WWW.sqcbbs.com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讨论长安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特点及其与唐诗政治抒情的关系问题。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一章，讨论长安文化与唐前文学的政治内容，认为：广义的长安文化是指以周秦汉唐等十三朝都城所在地长安为核心，包括整个关中地区而向外辐射的封建文化，它起源于周秦、形成于西汉、并于唐代达到发展高潮，包括了建都此地的各个王朝长期以来在本地域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之总和。长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和建都于长安的历代王朝密不可分，其核心是政治文化。而唐前诗歌、散文、小说等，以其丰富的政治内容及因之形成的反映政治传统，与这种文化环境相结合，成为唐诗反映文人政治生活、抒发政治怀抱的前提。

第二章，讨论唐代长安官场文化与唐代诗人的政治命运问题。认为：作为唐代长安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科举考试制度，对文人命运、文学创作及官场风气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杜甫、韩愈在长安官场多年艰难的科考、求仕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唐代长安官场中实际存在的利名相交、趋炎附势及官员专权等现象，造成了唐代文人普遍的政治命运之坎坷，这些成为唐诗抒发政治情怀之基础。

第三章，讨论唐代诗人在其坎坷仕宦经历中的政治抒情问题。首先，以岑参出塞及杜甫弃官入蜀为例，讨论处于政治困境中的诗人以其诗作进行政治抒情的问题。岑参在出塞过程中创作了不少政治抒情诗篇，杜甫入蜀途中也有重要的政治抒情之作问世。其次，以中唐重要诗人韩愈、元稹、李贺为例，对他们作品的政治抒情内容进行全面考察，以说明作者自身的政治坎坷与其作品表

现政治抒情精神之间的关系。韩愈诗歌反映了中唐时代普遍存在的政治问题，如藩镇暴乱、苛政扰民、权臣弄政、佛法蠹国、民生艰难及国家不合理的用人制度等，同时，他也以诗歌抒发了自己仕宦沉沦的情绪感受，其中，写遭遇不公正贬谪的愤懑与痛苦为主要方面。元稹作为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与白居易一样，也积极主张以诗歌“干教化”、“刺美见事”，为政治服务。他的新乐府诗反映宫女闭锁与王孙公子的闲置问题，写当政者耽于声色、劳民伤财及贤人见弃问题，写沦陷区百姓翘首盼望恢复问题，写连年战争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及无度的聚敛贡赋制度对妇女摧残和奴役等等，这都触及到中唐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除新乐府诗直面社会政治问题、表达讽谏鉴戒之意外，元稹诗歌也以诗自明心志、言政治抱负，疏泄政治悲怀，真实记录其在宦海沉浮中的心路历程。李贺诗歌既表达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理想、抱负，抒发仕宦受挫后找不到出路的失意、苦闷甚至愤激情绪，同时，作为唐宗室子弟，他也以其诗笔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诸如百姓生活的苦难、社会的贫富分化、权贵的奢华、贤良的难用，以及将士守边问题，宫女外放问题，最高统治者荒诞的求仙行为等，都在其诗歌反映范围之内。

第四章，从长安文化影响唐诗政治抒情性质的角度，讨论长安文化的尚武传统与唐诗尚武精神问题。在长安的建都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辉煌过的王朝，都不乏民族尚武心理。尚武的传统，是贯穿在长安文化早期阶段周秦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汉唐时期的长安文化精神，更体现出鲜明的尚武特色。唐诗所表现的尚武精神，归根结底，是与长安文化的尚武传统有关。唐诗的尚武精神，主要表现于互有关联的三个方面，即：崇尚从军行为，赞美武将，抒发诗人英雄主义怀抱。

第五章，从长安文化与唐诗题材选择角度，讨论长安历史文化视野下唐代咏史诗的政治抒情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浓厚史官文化传统的国度，唐代是长安历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唐代咏史诗发展成熟并走向繁荣，实非偶然。唐代咏史诗咏颂的主题、悲悯的主题、批判的主题，及那些以历史上与政治相关的女性事迹为题材创作的咏史篇章，都有极鲜明的政治抒

情特色。从唐人咏史诗的创作可见，沉淀在长安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关于历史人事道德的、政治的评判，已成为影响诗人政治抒情的基本因素。

第六章，余论，简要探讨了长安文化精神在宋代的承传问题。有宋一代，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虽已远离汉唐时期的长安地区，但作为一个时代、历史、文化之所指的“长安”，仍活在宋人生活中，沉淀在他们思维深处。宋词中长安意象的频繁出现，即反映了宋代士人对中华民族以往历史的接受、学习，对长安历史文化的追忆、留恋。宋人的政治革新意识，民族斗争中坚守信念的立场，与长安文化精神亦一脉相承。政治风波造成了宋代词人政治命运的坎坷，宋词之走向繁荣，与长安文化精神的影响，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序

近悉，李世忠同志所著《长安文化与唐诗的政治精神》一书，即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老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世忠于2000年考取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随我研习唐宋文学。他朴实稳重，话语无多。勤奋刻苦，好学慎思。所撰毕业论文《唐代咏史诗研究》，功力扎实，颇见独到心得，得到答辩委员会诸专家的一致好评，获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后，世忠赴咸阳师范学院任教。为在学术上继续深造，嘱我推荐，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离开兰州后，世忠和我多有联系，经常关心我的生活、工作和健康，师生情谊，历久弥亲，让我感到分外温暖。他于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多部。我为他所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因而，当他嘱我为本书作序时，我欣然应允，聊表祝贺之意。

陕西关中地区自西周以来至唐代，一直是历代王朝奠都的首善之地。诞生于此地的长安文化，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也始终是引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核心所在。世忠这部书稿，从长安文化背景切入研究唐诗政治抒情问题，探讨长安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我认为这个选题是很有意义的。纵观全书，约有如下突出特点：

首先，这部书稿在探讨唐代长安文化特点的时候，不仅对长安文化发展所经历的漫长历史过程做了追溯，而且，将长安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核心部分确立为封建政治文化，我觉得这个定位是恰当的。诞生于封建帝都的文化，自然会深深根植其政权建设基础之上，从而打上封建政治文化的烙印，文学在这样

的时代文化母体中产生，受它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这部书稿在探讨唐诗创作与长安文化影响诸问题时，能紧扣诗人身世遭遇进行思考，这个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在书中，作者采取例举形式，详细考察了唐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诗人的身世际遇与其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以推演长安政治文化环境影响诗人生活遭遇，而诗人自身遭遇的生活命运，又进一步深刻影响其诗歌创作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思路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第三，作者对笔下所论唐诗作品十分熟悉，对具体作品创作的背景及其抒情题旨的论说分析，也甚为到位。立足文本，用事实说话，反映了本书作者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资料引证的丰富，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书稿选题所涉及的学术前沿问题有深入了解，也反映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及对前人研究成果持有的尊重态度。严谨的学术规范意识，甚为清晰地论述思路，也显示了作者理性思维的周到成熟。此外，作者的行文语言也十分畅达，无晦涩迟滞之感，展其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总之，《长安文化与唐诗的政治精神》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创新价值的一部著作。因为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所涉问题历来十分复杂，世忠敢于在这个领域进行大胆探索，且作出这样的成绩，其学术进取意识实难能可贵。今后世忠如果还要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拓，不妨进一步扩大唐诗与长安艺术文化、家族文化等的观照面。唐诗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世忠已经在这个天地里有所收获，祝愿他随着这部著作的出版，再接再厉，不懈不骄，坚持优良端正的学风，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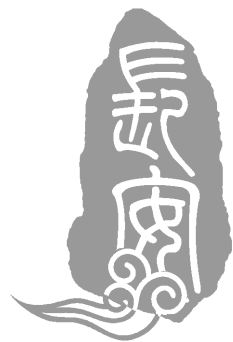
林家英

2013年10月28日

目 录

序	林家英
第一章 长安文化与唐前文学的政治内容	1
第一节 长安文化的形成及其政治背景	3
一、长安文化的界定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	3
二、长安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	11
第二节 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型特征与唐前文学的政治抒情	23
一、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特征	23
二、唐前诗歌、散文的政治抒情传统	26
三、唐前小说中所见之官场政治：以《世说新语》为例	33
第二章 长安官场文化与唐代诗人的政治命运	39
第一节 科举考试与唐代诗人的长安求仕活动	41
一、“功夫在场外”的科举考试	41
二、唐代诗人的长安求仕活动：以杜甫、韩愈为例	50
第二节 长安官场文化与唐代诗人的政治悲剧	74
一、唐代长安官场文化的特点	74
二、唐代诗人的政治悲剧：以《河岳英灵集》所录诗人群体为例	76
第三章 坎坷仕宦中的政治抒情	91
第一节 官场突围中的政治抒情：以岑参出塞与杜甫入蜀为例	93
一、岑参出塞及其边塞诗之政治抒情	94

二、杜甫弃官及其入蜀途中诗作的政治抒情	104
第二节 坎坷仕宦中的政治抒情：以韩愈元稹李贺为例	126
一、韩愈诗歌的政治抒情	127
二、元稹诗歌的政治抒情	151
三、李贺诗歌的政治抒情	168
第四章 长安文化与唐诗的尚武精神	179
第一节 长安文化的尚武传统	181
第二节 唐诗的尚武精神	197
一、崇尚从军行为	198
二、咏颂征战武将	206
三、赞美英雄主义	215
第五章 长安文化与唐代咏史诗的政治抒情	227
第一节 长安历史文化传统与唐代咏史诗的繁荣	229
一、长安历史文化传统述略	229
二、唐代咏史诗的繁荣	234
三、长安历史文化传统于唐代咏史诗发展的影响	242
第二节 唐代咏史诗的政治主题	246
一、咏颂的主题	246
二、悲悯的主题	255
三、批判的主题	264
四、女性题材咏史诗的政治主题	274
第六章 余论：长安文化精神与宋词的繁荣	291
第一节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293
第二节 长安文化精神与宋词的繁荣	302
主要参考书目	319
后 记	327



第一章

长安文化与唐前文字的政治内容

长安文化虽以陕西关中地区的封建帝都“长安”命名，然其文化精神所作用的范围，已不仅仅限于关中地区。它形成、发展的历史，与建都于长安的历代王朝密不可分，它的核心是政治文化。而唐前诗歌、散文、小说等，以其丰富的政治内容及因之形成的反映政治的传统，与这种文化环境相结合，成为唐诗反映文人政治生活，抒发政治怀抱的前提。

第一节 长安文化的形成及其政治背景

一、长安文化的界定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

长安一词在典籍中含义主要有三：

一指乡聚。北宋宋敏求《长安志》云：“长安，盖古乡聚名。在渭水南，隔渭水北对秦咸阳县。”^①元骆天骧亦云“雍之长安，其来久矣，乃古之乡聚名，在丰、镐间，周、秦时已有之。”^②陈直在《三辅黄图校证》中亦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又咸阳一带尝出土有‘长安’圆钱，当为秦物，足证长安之名始于始皇初期。”^③又，《史记·卢绾传》云：“卢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④这说明作为乡聚名称的“长安”一词起源甚早，大概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至汉代卢绾封长安侯，亦用“长安”指秦咸阳之故地，后以长安为县名亦此之衍生。

一指历史上先后在关中地区建都的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政权的都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⑤“汉于其地筑未央宫，谓大城曰长安城。”^⑥《三辅黄图序》亦云：“汉

①[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8页。
按：本文所引用文献，于各章节首次出现时，详细注明朝代、作者、书名、页数、出版社、出版年，以便复核；再次引用时，仅注明作者、书名、页数，以省篇幅。为统一体例，出版年一律以公元纪年标记。注释号码，统一置于正文或引文标点符号之后。

②[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序》。《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③陈直《三辅黄图校证·三辅黄图序（原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37页。

⑤[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2页。

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8页。

高祖有天下，始都长安，实曰西京，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也。”^①这说明作为都城名称的“长安”实含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另，作为都城名的长安，所指城池在汉及隋唐时期并不完全相同。据考古探察，汉长安城位于西周古都丰、镐二京东北、秦都咸阳之南略偏东一带，隔渭河与咸阳市北的咸阳市遥遥相望。杨坚公元581年建立隋朝时，因长安城历八百余年兴废已残破狭小，故在其东南又兴建大兴城作为国都，唐王朝建立以后的长安城即是易名隋大兴城而来。另据《汉书·高祖本纪》载田肯贺高祖云：“陛下治秦中。秦形势之国，带河阻山，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汉书》娄敬本传亦载此类言论。故西汉立都长安，“治秦中”，又使长安一词有泛指“被山带河”的关中一带之含义。^②

长安第三个含义是泛指封建时代的皇都。如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记载了北京地方历史、地理沿革及风习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该著时在其出版说明中云：“书名《长安客话》，长安是封建时代皇都的统称。”

除此外，“长安”还是武则天当政时期所用年号之一。

和长安一词的所指义相对明确不同，长安文化，则因“文化”一词古今中外见仁见智，故反倒是一个能指义颇为复杂的概念。据中国权威辞书《辞海》对文化一词释义：“从广义来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由此，对长安文化也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来理解。

①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三辅黄图序（原序）》第4页。

② 按：宋敏求《长安志》云：“内史周官《关中记》曰：‘秦西以陇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是为关中之地。东西方千余里，南北近山者相去一二百里，远者三四百里。’”《宋元方志丛刊》第75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二世皇帝二年”云：“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胡三省注此句云：“秦地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秦地居其中，故谓之关中。”又，因关中为秦人所居，故又称“秦中”。如《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云：“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胡三省注云：“秦中，谓关中，故秦地也。”以上见中华书局1956年版《资治通鉴》第282、383页。

笔者认为,广义的长安文化应是指以周秦汉唐等十三朝都城所在地长安为核心,包括整个关中地区而向外辐射的封建文化,它起源于周秦、形成于西汉,并于唐代达到发展高潮,包括了建都此地的各个王朝长期以来在本地域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之总和。以其物质层面论,至少包括了长安帝都的地理山川、城市建设、宫殿园苑、道路交通、宴游生活等。而狭义的长安文化则应是指形成于长安本地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精神创造的成果。如形成、创造于长安的政府组织机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及思想、宗教、文化艺术成果等。本书所论长安文化主要取其狭义内涵。

以地理范围论,长安文化形成于关中地区。《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①史念海认为,所谓“三之一”,是指秦未统一六国时的疆土,汧在陕西千阳县,雍在凤翔县,皆陇山之下。河为黄河,华指华山,华山黄河相距不远,因而可以说,关中指西自陇山,东至黄河的陕西中部。^②李浩认为,“关中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指义亦不尽相同,范围广狭亦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区别当与秦国在统一战争中迅速扩张、疆土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有关。”他在《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中所使用的“关中”概念,“略相当于三辅政区”,“有时也使用第二意,略相当于三秦”。^③

笔者同意上述论者关于“关中”地理范围的界定,由此也可以看出关中地区确是孕育、产生长安文化的主要载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以关中地区为地理支撑发展起来的长安文化,实质和关中本土文化又不完全相同。因长安长期以来作为一个行政概念使用,其含义已远远超出了其所指之地理范围,这和“关中”的纯地理所指完全不同。所以长安文化与关中本土文化在所指对象上也应该是

① [汉]司马迁《史记》第3261—3262页。

② 史念海《陕西在秦汉时期历史中的地位》,《文史知识》1992年第六期。

③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有差别的。作为不同王朝的政治行政中心的长安，其文化精神所作用的范围当然已不仅仅限于关中地区，所以长安文化与关中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这就好比当今西方社会以“北京”指代中国政府一样，北京文化在西方人眼里一定不仅仅是指称北京地方文化，那么长安文化在后人眼里，也就自然不会纯粹被看做是长安所在地的地方文化。

长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和建都于长安的历代王朝密不可分。

中国原始聚落的出现，可追溯至距今一万年以前，而以关中地区为地理依托、历数千年发展所形成的长安文明，其源头亦可追溯至人类史前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至8000年比较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和文化遗迹中，即发现有关中地区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文化遗存。其中西安半坡聚落遗址被认为是距今5000年前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一处比较典型的聚落遗址。从其房屋造型、居住环境设置等方面看，它表明距今5000年前，今天的关中地区已经有了能够创造简单而丰富、原始而理性生活环境的居民。

长安文化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周文化，周文化的创造者是周人。“夏、商以降，史料渐丰，周之文化，烂焉可观。”^①据《史记·周本纪》，周祖先后稷封于邰，其后人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②庆节卒后，至其第八代子孙古公亶父立，因受到戎狄攻击，“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③古公亶父之后，他的孙子文王姬昌立，“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④后来，“武王作镐”，“周复都丰镐”。丰京位于今陕西长安区丰水以西，镐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第112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第114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第118页。

京位于丰水以东。两京隔水相望。据考古发掘，仅镐京遗址，已知部分达四平方公里，象征王权的宫殿建筑群极其复杂。

周的兴起与君临天下，急遽扩大了其文化上的影响力。“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①周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典型西部农业文明，为长安文化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以《周礼》等为代表的典章制度则是周人在长期社会组织实践中结出的精神财富之硕果。“中华民族素为‘礼仪之邦’，而立国的一切礼乐制度、人伦道德，乃至建筑规制等，皆肇始于西周。”“周代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民为邦本’的思想，一直成为后来儒家重道德重现实的主导思想。”^②“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其著于典籍者，虽经秦火，所存犹夥”^③，其为长安文化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文化是长安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石，也是长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依柳诒徵之见，秦民开化甚迟，“盖虽居周岐、丰之地，而其文教实别为一系统，与周之故俗不相衔接。”^④秦从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献公二年（前383年）近300年的时间里，都雍城（今陕西凤翔）。“《禹贡》九州，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⑤雍城的名称即取自古九州之雍州。这里既是秦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其先公宗庙所在地。^⑥《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秦徙都咸阳。秦代的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郿、杜，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连属。”^⑦由此见，

①[清]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16页。

②杨东晨《陕西古代史》之石兴邦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138页。

④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354页。

⑤陈直《三辅黄图校正》第1页。

⑥参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凤翔队《秦都雍城遗迹勘查》，《文物》1963年第八期；陕西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勘察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二期。

⑦陈直《三辅黄图校正》第7页。